学术动态

《满族文化的转向(1583—1795 年)·导言》

黄 培 著 董建中 译

满族是当今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历史悠久。他们所创建的清朝（1644—1912）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高峰，以其疆域的广袤而著称，被现代中国所继承。他们是女真人（属于通古斯南支）的后裔，在过去他们被中国视为外来者，但外来者的这一面被明朝（1368—1644）遗民和辛亥革命的组织者夸大了。满族深具文化适应性。他们由女真人和非女真人组成，后者包括蒙古人、中国人和朝鲜人等。正如有位学者所指出的，满族一词在严格意义上不表示任何的“种族”。总之，满人与中国人很接近，不是真正的外来者或“蛮族”。他们不断适应中国文化，变得与中国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①]

满族的历史引人入胜。若不考察他们的直系祖先—女真人，人们就无法理解它。女真人出现在中国东北边疆，他们组成氏族、部落和区域联盟。他们创建了金朝（1115—1234），这是一个幅员广大的王朝，包括东北、部分蒙古以及华北地区。许多在华北的女真人不断地适应了中国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被蒙古的征服者划归为“北方汉人”。那些依然在故土——黑龙江—松花江地区——生活的女真人，历经分化重组，向辽东迁移，最终成了满人的直系祖先。明朝时，他们被置于卫所制度之下——这是一种羁縻的组织，他们被分成三部：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努尔哈赤（1559—1626）及子皇太极（1592—1643）出自建州左卫。[②]在统一女真过程中，他们得到了非女真人群的帮助。1635 年，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皇太极将他治下的各人群称为“满洲”，其核心当然是女真人。接着他建立了清朝，清朝成为第二个征服中国的边疆王朝。

一、主旨和方法

本书研究满族，如何吸纳中国人的治理方法和生活方式，以及在 1583—1795 年间他们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研究包括满族在内的中国边疆人群中国化（sinicization 或 sinification）的著作，主要是论文。笔者则以整本书对此进行研究。本书采用分析、系统和专题讨论的方法，而以满族在经济、法律和社会等主要的接受方面为重点。然而，为了显示中国文化对于满人影响的深度，本书有时候也包括了一些被人忽视且重要的内容，比如说女真猎人和战士用的粮袋，满文称为法都（fadu），原是朴实无华、牢固的袋子，逐渐转变成荷包，而荷包是中国人具有审美意义、小巧精致、随身携带的小袋。这种取代，证明满族尚武精神的衰退，而尚武是他们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此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化绝非是单向的。满族在接受中国文化的同时，也给中国留下了深深的文化印记。因为满族对中国的文化影响应作为专题研究，本书的讨论，正如书名所示，集中于满族文化的转向。[③]在 1583 年努尔哈赤起兵

[收稿日期] 2012－03－20

[作者简介] 黄培（Pei Huang），男，美国扬斯敦州立大学（Youngstown State University）荣休教授；董建中（1971—），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北京 100872

反明之前，中国化已经发生，在乾隆期（1736—1795）达到了高潮。甚至是在清社既屋后，满人依然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满族对于中国文化的接受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女真人时期，以辽东边疆为主要背景。女真人从十四世纪中叶开始，由今天黑龙江的依兰地区南迁，一直持续到十六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他们通过地理、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种种渠道与中国保持联系。这是一种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关系。这种持久及多方面的联系提升了女真人的经济和技术，促成了努尔哈赤边疆政权的兴起，为清朝奠定了基础。他们借用了许多中国的词汇，丰富了自己的语言。中国也受益于女真人的马匹、皮张、人参和珍珠。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关系帮助明朝维持着其边疆的和平。到皇太极将女真改名满洲，从而为其臣民铸造了一个新的族群名称，这一阶段即告结束。第二年即 1636 年，皇太极宣布建立清朝，开始了第二阶段——这是本研究的重点，这一阶段满族是中国化的积极参与者。1644 年，他们征服中国开创了新的局面，双方的联系更为方便、广泛和深入。这时，满人面对着一个中国人占优势的社会，比以前的女真人所受中国的影响更多。中国人的行为规范、习俗以及生活态度浸入满人的文化传统，进而削弱了他们族群的凝聚力。他们无望地落入认同危机，这是清朝皇帝力图克服的困境。

Sinicization 一词最早出现在 *Atheaeum*，这是在伦敦出版的一种文艺周刊。1898 年在评论一本关于日本著作时，一位学者提到日本人的神道是受“sinicization”影响。尽管评论者没有进一步描述该词，但它很快就被各地的学者所采用。[④]各种字典对 sinicization 的定义不一致，这令情况变得糟糕。《牛津英语辞典》的定义是“sinicizing 的动作或过程”，而将“sinicizing”定义为“赋予中国人的特性”。《韦氏新国际英语辞典（第三版）》中，“sinicize”意思是“受中国影响而起的改变”。同一动词在《兰登书屋英语辞典》的定义是“使（人）拥有中国人特性或置于中国人的影响之下”。即使在今天，学者们对于它的含义还是意见不一，难以准确地界定。一些人是从族群同化来解释，另一些人则视其为对制度的采用或文化的熔合。[⑤]上述辞典给出的定义尽管有不足之处，但对于我的研究还是有所裨益，因为我使用该词，只是作为研究满人是如何被置于中国人影响之下并获得中国人特性的研究框架。为了便于研究，我将 sinicization 定义为采用、适应，或参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诸如态度、礼仪、思想、信仰、价值，和各种制度。

我采用“sinicization”一词，是因为它比其他两个术语——涵化（acculturation）和同化（assimilation）更适用于我的主题，后两个术语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涵化”一词是美国人类学家创造的，他们是要考察印第安人在与白人殖民者接触后的文化变迁。换言之，该词产生于殖民背景，具有征服和皈依基督教的特点。因此人们会置疑它是否能适用于不同背景的社会。“同化”是社会学上的用语，指从属人群的文化可能被处于支配地位人群的文化所吞没甚至摧毁。事实上，它主要关涉移民中的个人或小团体，他们渴望进入当地社会的主流，但受各种机缘和变数的制约。[⑥]涵化和同化不能成为我研究满族的范型，满族开始时是中国的边疆民族，最终成了征服中国的少数族群。满族的经历可以用中国化这一主题更为有效地加以解释，Sinicization 一词一经出现，就被国际学术界认可。此外，中国化是中国人口和历史被塑造和重新塑造的过程。例如，中国早期的人群经由中国化而聚合在一起。秦朝于公元前 221 年统一中国，将许多族群置于单一的帝国框架之内，帮助塑造了中国人。220—581 年以及 907—1234 年，匈奴、鲜卑、突厥、契丹以及女真等边疆人群作为移民或征服者进入华北。最后他们加入到中国的主流，成为一个更大社会中的少数民族。满族所经历的是同样的进程，应该从中国化的角度进行研究。这是一个整合过程，今日仍在中国进行。[⑦]例如，所有中小学学生都必须学习普通话，不论他们在课外使用何样方言或民族语言。

我们不能将中国化限制在中国文化或制度的单一方面，因为中国化包罗广泛，情形复杂。因此，一个人是否被中国化不能从任何个

别因素判定，也不能将其解释为偶然接触的结果。中国化没有明确的起止时间，因为它是一个多渠道、持续的接触过程。一个中国化的满人是已经接受了某些中国文化特质的人，但并没有完全接受。已被中国化的满人，十有八九没有意识到被中国化——因为在专家看来，族群认同是一种主观的，同时也是可变的感知。他们所视作满族的传统，实际上是由于接触所带来的、已包含了中国文化成分在内的一种重新解释。[8]

我们可进一步指出，满族是中国历史上所有边疆征服者中中国化最深的族群。他们创建了征服王朝中最为持久的政权。1644 年后，几乎所有的满人移居中国本土，其环境不同于辽东边疆。在这里，他们在人数上远被中国人所超过，在文化上受中国式生活方式的影响。除政治控制外，他们实际上是一个更大社会中的从属文化体。然而，这不是一个开化过程，因为满族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也不意味着中国文化彻底取代了他们的传统。辛亥革命从满族手中拿走的是他们的政治统治地位，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他们是今日中国一个活跃的少数民族，人口有上千万之多。

中国化是长期接触的结果，但这种接触不是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刻意安排，而是中国及其边疆邻居出于互惠愿望所致。在这种接触中平民正像他们的首领一样，起着重要作用。尽管在史料中鲜有普通人的身影，但他们的活动可从上层社会的材料中觅得端倪。在早期，这些平民与中国、朝鲜的边境居民保持联系，以获取布匹、农具和许多其他日用品。他们袭击中国和朝鲜的边境，将俘虏、逃兵或逃亡者驱使奴役。征服明朝后，他们在一个中国人占优的社会中成为统治阶级。但是在中国文化的冲击下，他们的族群认同式微了。经过两三代后，他们忘记了母语，放弃了尚武美德。在君主命令下，他们要与官长一道，参加充满着儒家教化理念的讲约，这实际上进一步“稀释了”他们的文化传统。随着人口的增加，他们经济日见拮据，转变成了一个为生存而挣扎的利益群体。在此种环境下，清廷未能将他们保持为一个紧密结合的族群；也未能维持住他们的特权地位。最终，1865 年的一道上谕允许满族官兵出旗，选择生计，在中国官员治下编户为民。[9]

在此应该指出，清朝统治者虽然努力保持满族为一个有凝聚力的族群，但他们实际上帮助了中国化。皇太极不同于乃父努尔哈赤，他更进一步吸纳许多中国人为其服务，采纳中国的制度，计划征服明朝。他的继承者，特别是从康熙到乾隆，面对着两个文化世界：满族的传统和被征服者的传统。[10]他们通过种种措施支持中国文化以利于自己的统治。康熙皇帝所采取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是建立上书房，给皇子们讲授许多课程，包括中国历史和典籍。雍正爱好禅宗；其子乾隆，赞助中国学者、艺术家、文人和出版事业。但他们不是中国文化的俘虏，因为他们警觉到自己族群身份的政治重要性。他们反复劝诫满族紧密结合回归他们的文化传统。经由早年的教育，儒家的教训已经深入他们的内心，他们把它与满族的准则整合在了一起。[11]事实上他们的劝诫是用儒家词语表达的。他们不知不觉中加速了他们所竭力想要制止的事情。

一些研究亚洲的学者，可笼统地称作“新清史”学者，不接受 sinicization 一词，认为它有偏见，有误导性，概念上有缺陷。他们的许多批评似乎是源自他们对该词有误解，可能因为它含义模糊所致。例如，他们认为这个词含有概念上循环推理（circularity）之缺陷。可是，这种循环性存在于文化变迁之中，主要是个持续的文化变异过程。他们也将 sinicization 等同于大汉族主义，和“二十世纪汉人的民族主义”。这些联系可以辩论，因为该词是欧洲人所创造，当时中国正处于外来帝国主义的极度压迫之下，它与大汉族主义或民族主义并无关系。[12]作为地区大国，中国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丰富，对于边境毗邻各族有着吸引力。新来者通过移民、入侵或是占领，如同美国的移民一样，采纳了地主国的文化，并加入其主流文化。这是一个追求最大自利的自愿行动，与中国中心的概念（China-centered concept）没有任何关系。将“sinicization”误解为大汉族主义或民族主义，也可能是来自该词曾有的中文翻译——汉化（变成汉人）。译文中的“汉”似乎并不恰当，因为汉人与想

像不同，并非是个单一或不变的人群，而是一个有着许多方言和不同风俗的人群。这意味着汉人中间存在着地理上和族性上的差异。尽管汉人构成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现在中国有五十多个其他的民族。[13]不论 sinicization 这一名词如何起源，它都不会丝毫减弱满族对中国历史的贡献。事实上，中国背景更有力地说出了满族遗产的重要性。

“新清史”学者的另一批评与中国化和满族文化有关。正和他们的看法相反，这两者间关系并非对立，可以并行不悖。清朝统治者采纳中国文化，希望赢得中国人的支持。与此同时，他们尽量保持满族文化，作为一个紧密的统治集团。这两个目标出于相同的动机，彼此并不冲突。出于现实的考虑，他们的满族臣民采纳了中国文化，加入了被统治者的主流，但是他们还是满族的成员。族群研究专家都承认，一个族群在与其他族群交往过程中，其传统文化会发生变化。结果，有些成分逐渐变弱并最终被遗忘，有的则回到中心位置，又有新的内容被采纳。[14]这也适用于 sinicization 这一概念，根本上它是一个渐变过程，并不取代一个族群的全部文化。

“新清史”学者尚有另一理由排斥 sinicization，因为在十八和十九世纪时，满人仍然身居高位，为了安全起见，许多清朝官方文件仍用满文书写。[15]他们的论点似乎并不切题。中国化并不必然要将满人从高位排除，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统治阶级。大多数满人高官既忠于清朝皇帝，也忠于儒家价值观。语言本身尚不足以证明一个人的族群身份或是否定中国化的作用。自 1644 年开始，越来越多的满人，包括精英和大众，都对中文感兴趣并忘记了自己的母语。例如，乾隆皇帝的两个侄子，就不会说满语。人们有理由相信，乾隆朝时，皇族分成了两个不同语言的支派：说中国话的和说满语的。[16]

满文书写和口语的情况相同。1860 年以降，满族指挥官毋需再提交满文军报，除非他们不懂中文。晚清的君主要求满语文件，主要是将其作为统治阶级的族群象征。的确，大多数满文档案还没有被研究者利用。如同“新清史”学者所推测的那样，这些档案可能包括一些重要的信息，但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即这些文件不含有任何有关中国化的信息。比如康熙和雍正朝满族指挥官和地方大员所提交的大量满文密奏，现在都可以看到了。它们没有包含任何不利于中国化观念或是有利于“新清史”学者的材料。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一旦满文档案的内容为学界所知，即使某些特别方面可能有变化，但对清朝的整体认识将与现在的相同。[17]

“新清史”学者最后强调中国人对满族的仇恨问题，这一点，以图证明 sinicization 这一概念无法成立。[18]这种仇恨虽曾一度激烈和广泛的存在，但随着时间而消褪。到了十九世纪，两者间的族群界限已模糊不清。中国人和满人都聚集在清朝统治者周围，反对外来帝国主义。十九世纪中期的叛乱，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它用民族观念痛斥清朝，但从本质上看，这些叛乱与以前中国历史上的造反一样，以推翻政府为目的，而这恰巧是满族治下的政府。人们应该记得，所有这些十九世纪中叶的动乱都被中国人的武力，例如，湘军、淮军等所镇压。湘军进一步又从回教反叛者手中收复了新疆。光绪皇帝（1875—1908 年在位）与中国士大夫密切合作以实行立宪改革。改革失败后，这些中国官员组成保皇党，在国内外积极活动。为了消除他们的影响，孙中山（1866—1925）领导下的革命党人提醒国人，满人在征服明朝时的残酷，以及清朝在抵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无能。清朝覆亡前后反满的暴力行动，是零星的并很快消失。中国学者认为清朝是个外来政权，应为中国的许多问题负责，但仍极力推崇清朝是帝国的建立者，中国文化的推动者，等等。[19]

在“新清史”学者看来，满族和内陆亚洲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认为，凭藉这些联系，清朝的皇帝能够从蒙古人、西藏人和回教徒那里吸取不同的意识形态及作法以创立清帝国，并以不同身份实行统治。[20]但是，历史迹象并没有证实这种理论。中国在清帝国的地位举足轻重。它是帝国的地理、政治和财政的根基。清朝君主从他们位于北京的宝座上统治着帝国。他们死后葬于畿辅地区，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很显然，中国是他们生活和事业的中

心。本书的研究并不涉及蒙古、新疆和西藏，仅仅是关注满族适应中国的生活方式。

材料显示，“内陆亚洲”的族群，尤其是蒙古人，在清朝征服中国时并没有起重要的作用。这一征服主要是满人和他们的中国合作者行动的结果，后者的炮兵部队，在皇太极时期对于击败明朝军队作用极大。1593 年，三个蒙古部落首领带兵加入六个女真部落，企图消灭努尔哈赤。此后许多蒙古人，如察哈尔部，站在明朝一边进行战斗。大量事实表明，满人成功控制蒙古、新疆和西藏，是通过外交和战争的结果，而不是通过他们与内陆亚洲的关系或是通过他们的蒙古盟友所致。随着元朝（1279—1368）的覆亡，蒙古人四分五裂。在东北的主要是科尔沁部，起初反对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通过战争和联姻，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赢得了一些科尔沁部落的支持。林丹汗（1592—1643）是位雄心勃勃且暴虐的统治者，察哈尔蒙古在他的领导下兴起，逼迫土默特、喀拉沁和奈曼等蒙古部落向满人寻求保护。在数次远征之后，满人摧毁了林丹汗势力，控制了内蒙古。[21]

满蒙关系中，厄鲁特蒙古的情况更为复杂。在他们好侵略的统治者领导下，厄鲁特蒙古入侵外蒙古的喀尔喀蒙古，占领西藏，严重威胁着清朝的北部和西部边疆。为保卫帝国计，清朝的君主，从康熙到乾隆，发动了针对厄鲁特蒙古的长期战争。相当数量的绿营官兵参加了清朝的每一次军事行动，作战所需的物品大部从中国本土筹集并转输而来。[22]厄鲁特蒙古的战败，使清廷得以控制了外蒙古、新疆和西藏。清帝国的建立和维持在很大程度上倚赖的是军事力量，对此中国本土作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也应当在此指出，清初的统治者并不相信蒙古人。努尔哈赤曾两度痛斥一些蒙古结盟者在其边疆政权内劫掠和杀戮。皇太极更是怀疑蒙古人，禁止臣民给予或出售武器给他们。他发布长篇训词，申斥科尔沁部落首领奥巴，因其欺诈、通敌，未能如期参加针对察哈尔蒙古的联合行动。康熙帝认为蒙古人贪婪、卑贱和可怜。[23]清朝君主对蒙古的不信任，具有正当理由，例如 1645 年的苏尼特和车臣蒙古造反，1675 年察哈尔蒙古的叛乱，特别是后者，正值清朝与三藩（1673—1681）作生死较量之时。1750 年代中叶，清朝平定厄鲁特准噶尔部的战争期间，喀尔喀蒙古也曾造反。[24]

满族以外的内陆亚洲族群，在清帝国的统治系统中没有起过重要的作用。内阁和军机处是清帝国官僚体系的最高层，尤其是军机处，对于蒙古、新疆和西藏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是，有清一代，仅有十位蒙古大学士，九位蒙古军机大臣。这十九人与他们的满族和中国同事相比，比例极小。而且，有五人供职于这两个衙门，因此最高级别蒙古官员的实际数目是十四人。蒙古人甚至在理藩院也处于次要地位，这一官署是为处理蒙古事务而设立的。然而，在 152 年间（1644—1795），仅有十一位蒙古人出任该院的尚书。[25]在最高层的帝国官僚机构中，没有西藏人和维吾尔人。总之，内陆亚洲族群对于清帝国的贡献不如满人和中国人。

上面的分析显示，以满族特性或亚洲内陆的视角研究清史，对清朝或今日满族的少数民族的地位不太可能有任何重大改变。与“新清史”学者的观点相反，中国化的看法没有贬低满族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正如权威字典所下的定义，中国化这一概念并不包含任何中国文化或道德优越的认识。该词所有的附加意义，似乎是由一些学者曲解该词所引入的。因此，应质疑的，不是该词本身，而是使用它的方法。如果运用得当，它是解释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与边疆民族关系的有用工具。

二、内容和材料

本研究分为八章，外加导言和结语。现在所写的就是导言部分，因此不必再进行概述。第一章解释历史悠久且复杂的满族血系，它以女真人为核心，以非女真人的成员——蒙古人、中国人和朝鲜人——为外缘。女真人为满族的中国化打下了基础。第二章研究努尔哈赤所创立的边疆政权。他的两个杰出儿子，皇太极和多尔衮（1612—1650）创立清帝国，并加速了满人适应中国的生活方式。从总体而言，这两章建立了满人吸纳中国文化的框架。

在第三章，我讨论了东北地区的生态系统以及农业、边境马市和朝贡贸易对于女真经济的影响。经济活动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拓宽了他们与明代中国的联系，有利于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吸纳。

第四章将辽东视作边境社会，集中探讨边境和跨境居民。他们的活动帮助将中国文化介绍给女真人。行政和司法机构是第五章探讨的内容。自皇太极以来的清初君主采用了明朝统治机器和法规。这些中国的制度改进了清朝的统治组织，同时满族也对这些制度作了某些改进。满族社会制度的转型，包括婚姻、丧葬以及起名，是第六章关注的问题。这些变化极大地弱化了满族的尚武精神。

第七章考察了满族语言和文学等方面的变化。满文的重要性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尽管直到清朝终结一直保持着官方身份，但它早已“失去了生气”。因为教育的关系，满族诗人和作家，用中文写作，遵循中文文法。最后一章探讨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宗教信仰、社会规范、习俗对于满族传统的影响。圆明园的建筑代表了中国审美效果的巅峰。出于政治的考虑，早期的满族统治者，赞助中国佛教、大众信仰以及儒家学说。康熙和雍正的劝化作品，通过全国各地的宣讲，灌输给中国人和满人。

结论部分概括全书，同时也对中国化提出了进一步看法。其中一个观点是：中国文化和满族传统并不互相排斥。不论如何中国化，清朝的政治制度还是保持了一些满族特色。甚至今天的满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也能够保持一些民族传统。另一观点是：满族也给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举例而言，从地理上看，现代中国从清帝国继承了蒙古、新疆和西藏等重要的边疆地区。因为满族成分之加入，中国文化和历史必须进行重新解释。最后的观点有关满族对于中国化的反应。

我所使用的材料分为基本史料和专门论著。第一类是档案材料、官修书籍、奏疏汇编、地方志、谱牒以及当时人载述。总体而言，它们提供了有关女真人的族群构成、经济生活、社会结构和政治发展的信息，以及受到中国文化影响所起的变化，这些对于满族兴起和中国化都很重要。新旧两种满文档案 《旧满洲档》和 《满文老档》是政治性的记述，表现出女真人和明代中国边境地区间的关系。台北中研院所出版的两大部明清档案也是如此。康熙和雍正朝满文奏折汇编，包括了各种重要材料，比如储位之争、康熙印刷中国典籍、西北的军事行动以及皇帝对于族群的敏感。依朝代为序、从康熙到乾隆的 《宫中档》中文奏折汇编，同样重要，俱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满文和中文两种奏折汇编，证实了满族传统日益式微以及皇帝们为恢复它所作的种种努力。《八旗档》包括谱系、世袭、任官以及杂项文件，提供了有用的八旗精英传记资料。档案材料中，以 《明代辽东档案汇编》最具价值，它对于该地区的许多方面都有揭示，包括边境马市和女真人的掠边和移民。这些活动都有利于女真人的中国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也极有用处，这是明朝档案的多册本汇编，出版于 2001 年。[26]

明清时期政府编写了许多类型的官书，其中包括 《实录》，这是国家重要政务的编年体史书。《明实录》包括女真首领的任命、进贡使团、移民和中国逃兵、逃亡者，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女真人——满族先人——的中国化。《明史》为我的研究提供了背景信息。清初各朝的 《实录》，包括记述努尔哈赤时代的满文本，偶尔揭示了满人价值观的变化。它们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记载的不足，可由朝鲜李朝 (1392—1910) 实录予以补充。它有两个版本，一是 1955—1958 年的汉城版，一是 1953—1968 年的东京版。从太祖到仁宗朝 (1392—1649) 的李朝实录，对我的研究最为有用。[27]

两种关于八旗的清代官方出版，以满文和中文分别在 1739 年和 1799 年刊行，极其有用。其中包括了四千多名文武官员的传记；孝义和节妇的材料显示出满族对于中国文化的大量吸纳。在雍正的主持下，出版了有关旗务的三部官书，它们相辅相成，书中有上谕以及来自八旗的奏疏。从整体上看，这三部书显示出满族中国化的迹象。1783 年，清廷出版了关于满族起源的书籍，篇幅不大。卷十六至二十显示了大量中国文化对于满人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的影响。[28]

有的材料是明清官员的奏疏汇编。《筹辽硕画》包括了明朝官员的奏疏，其中有一些官员曾于 1618—1620 年间，在这一地区供职或出差。清廷禁止此书的刊行、流传，因为这些奏疏记录了对于满人不利的信息。在 1632—1635 年间，文馆中的中国职员向皇太极建议采用明朝的制度，现在存有他们的九十七件奏疏。官员们有自己的奏疏集。熊廷弼（卒于 1625 年）两次镇守辽东抗击努尔哈赤，他的奏疏值得研究。何尔健曾是该地区的巡按，他的奏疏中讲到许多中国人逃往女真地界，组成了一个名为千家庄的村子。[29]

地方志提供的辽东边境自然和人文环境信息，是其他材料所没有的。辽东方志最有价值，它有两个版本 《辽东志》及其增补本《全辽志》，都有修订本。它们提供了人口数字、地方风俗、边境通事、女真文化等资料。开原是座设防的城市，也是互市所在地，1620 年前后完成的《开原图说》，详细记述了扈伦四部及部落间的事务，以及这四部与中国的关系。[30]

满人的谱牒提供了亲族结构、姻亲关系、丧葬风俗以及对文职官位的兴趣，其中有中国影响的线索。它们也揭示出满人名字的变化。从康熙朝开始，满人已接受了中国人的取名习俗。大多数满人谱牒，不论官修还是私修，出现于 1740 年代初。清帝的家谱—— 《玉牒》，以满文和中文书写，有许多支谱。官方编纂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于 1745 年用满文和中文刊行，有了七千多人的小传，包含极其宝贵的信息。[31]

私修谱牒似乎始于汉军，在十九世纪已司空见惯。学者们近来在辽宁发现了许多满人谱牒。在政治意义上，满人需要材料以证明他们对于爵位和职官承袭的合法性。他们受中国的传统影响，编纂谱牒以保存家族的价值理念。[32]额亦都（1562—1621）来自钮祜禄族，是个杰出的战士，他的族谱，精心编写，多次修订，资料丰富，成为一些族谱，例如《满洲镶红旗瓜尔佳氏族谱》编写的样板。[33]

十六世纪以后，辽东的局势每况愈下，女真人引起了中国和朝鲜学者的注意，其中许多人是官员，最好的中文记述是茅瑞徵（活动于 1597—1636 年）的《东夷考略》，它含有女真人居地、生活和习俗、马市以及努尔哈赤崛起的材料。方孔昭（1591—1655），曾于 1630 年代晚期出任高官，他撰写了《全边略记》，其中一卷是关于中国逃兵和逃亡者，以及女真人对于中国居民的影响。瞿九思（1546—1617）写有反叛者、贼匪头目、少数民族以及边境部落等的传记，第十一卷写女真首领的更替，与中国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商业活动。[34]

一些朝鲜材料是第一手记述。其中一种是申忠一（1554—1622）的《建州纪程图记》，这是他在 1596 年见到努尔哈赤之后所写。李民寏（1573—1649）是朝鲜官员，随朝鲜军队帮助明朝对努尔哈赤作战，在 1619 年的萨尔浒之役中，他被女真人俘虏。以被俘期间的观察和询问为基础，他的书几乎涵盖了女真人的全部生活，并认出了加入女真人的中国人和朝鲜人。[35]李朝被臣服之后，送了三位王子去当时满人的都城沈阳，作为人质和联络人员。1637 年至 1644 年，他们向李朝奏报，从这些报告中编辑了三种文献，包括有关满族风俗、朝鲜俘虏、以及朝鲜与女真通婚所生后代等信息。《沈阳状启》含有上面所说的奏报，基本上是向承政院的状启；而《沈阳日记》则包括了沈阳馆所的日常活动。最后一种《沈馆录》，是前述两种的一个节本。[36]

我看了数目庞大的亚洲和西方专家的著述。因篇幅所限，下面所分析的著述是经高度选择的结果。大部分的研究并不专注于满族的中国化，但我能够从中抽绎出零星材料，尤其是有创新的观点，以丰富我的研究。

中国边疆民族包括满族中国化的研究，主要是一些论文。王桐龄的研究只是这一问题的概述。毛汶的文章讨论了中文对于满文的影响。1950 年代，中国边疆史研究专家姚从吾，出版了一系列有关辽代契丹人和金朝女真人的研究。他认为，中国历史的扩张和延续由于边疆各族相继接受中国文化所致。1960 年代，满族中国化研究取得了更多的进展。另一位专家管东贵所写的一些文章，给出了中国化的定义，分析了农业对于女真吸纳了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并探讨了满族发源地——东北地区的中

国化。伯恩—麦克尔·林克的研究，是关于满人征服期间，中国对于满族政权官僚机构设置的影响。何柄棣的文章，有系统地研究中国化对整个中国史的影响，特别谈到了清代。最近，郭成康写了一篇从文化融合的角度看中国化的文章。[37]

几乎所有的中文著述，例如《清代史》和《清朝通史》，都抱怨清朝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未能保护中国以抵抗外国帝国主义，但它们都肯定了满族对于中国的贡献。对于女真人和满人以及他们与中国和朝鲜的关系，已有很好的研究，比如河内良弘、和田清、三田村泰助、孙进己和李燕光。魏斐德的《洪业》探讨了辽东的边境社会、满族的兴起、清朝的建立、对中国的征服、统治机构的创建，以及中国对其影响。[38]

许多著述关注从努尔哈赤到乾隆时期的清代统治者，包括他们努力保持满人的族性，以及他们在吸收中国文化中所起的作用。一些学者认为皇太极是文化和制度的改革者，他从乃父那里接收一个重视女真—蒙古的边疆政权，但他依照中国的样式，将其变成了一个中央集权、官僚制的帝国。正如近来研究所指出的，在范文程（1597—1666）和洪承畴（1595—1665）的导引下顺治朝采纳了儒家文化。康熙和雍正朝（1662—1722，1723—1735）进一步中国化。在历史学家看来，康熙是位伟大的君主，因为他维护了中国的统一，击败了厄鲁特蒙古，采用了更多中国的制度，并刊印中文典籍。学者们都认为，雍正帝是位高效、勤政以及惠民的专制统治者。他对康熙皇帝所颁布的、基于理学信条的圣谕十六条，进行长篇阐释，即《圣谕广训》，并将它在所有臣民中进行灌输。乾隆皇帝是位多产诗人，喜爱中国艺术，蒐集珍贵书籍，并如他的先人所做一样，极力保持满族的传统。[39]但是，他努力强化的满族传统早已包括了中国文化的成分。

对于满族政治、法律以及社会制度的中文研究中，张晋藩、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最为出色。它主要从满族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刘小萌的《满族的部落与国家》也很重要，研究氏族、村落和部落制度，以及它们转变成为一个边疆政权。日本学者中，神田信夫研究满人的文馆，而鸳渊一讨论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统治时期的刑法。房兆楹探讨了幼子继承制，这是满族的一个重要社会制度，在十八世纪初影响逐渐减弱。杨英杰的著作几乎包括了满族社会的各方面。[40]

满语是通古斯语族的一个分支，一如赵振才在研究了民族学、考古和文献的材料之后得出的结论：它与中国语言有着共同的语言因素。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语的借用词汇，有助于中国语言在满人中的流行。满人对于中文经典的翻译，自然方便了中国文化的传播。据J. R. P. King的研究，新满文的“点”与“圈”是从朝鲜的书写体系中借来的。[41]

近来一些学者对满族文学产生了兴趣。据张佳生的研究，满族诗人早在十七世纪下半叶之前，就已出现了，首先是出身于官宦贵族家庭，接下来是出自平民家庭。满族诗人的各自背景，虽然不同，但又有一些共同性他们师从中国文人，用中文写诗歌，遵照中文诗歌的格律。性德（1655—1685）是清朝最重要的词人，他是贵族诗人的代表。其他类型的诗人如富宁、长海，出现较晚，他们追求的是文学成就，而不是仕途。[42]

亚洲和西方学者已证实了中国风格建筑，对于满族的宫殿、寺庙以及帝王陵寝所发生的影响。村田治郎对于沈阳宫殿作了细致研究，并附有图解。铁玉钦是位研究满族世系的清史专家，认为中国式建筑影响了满人在辽阳和沈阳宫殿布局的演进。斯沃特和蒂尔的文章得出了相同的结论。[43]

一些学者研究宗教和哲学。满人信奉萨满教和中国佛教。《萨满教研究》以田野调查为基础，涵盖了萨满教的历史、仪式以及萨满巫师的训练，提供了最为丰富的信息。顺治帝和雍正帝是禅宗的赞助人。然而，为了控制蒙古人和西藏人，清廷资助喇嘛教。[44]清代对于儒学的赞助始于皇太极，在康熙朝达到巅峰。吕士朋、刘志扬，尤其是何炳棣等学者近期的许多研究，都认为这种赞助对于满族的中国化很重要。[45]

＊本文译自 *Reorienting the Manchus: A Study of Sinicization, 1583—1795* 一书的“Introduction”部分（第1—30页），该书属康奈尔大学东亚研究丛书于2011年出版（Number 152 in Cornell East Asia Series）。本翻译得到了作者和康奈尔大学东亚研究丛书的授权。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多次向作者请益，现译文反映了作者的主旨，但译文仍由译者负责。

①拉铁摩尔认为通古斯人以“文化适应性”著称，见氏著《中国东北：冲突的摇篮》（Owen Lattimore,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rev. ed., 1935），18—19页。满族作为南通古斯人的一员，可以设其具有同样的特点。所引文字，见李济《历史上的中国东北》（Li Chi, “Manchuria in History”,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6.2, 1932），227页。

②关于中国东北作为一个地理和政治身份的演进过程，见欧立德《帝国和国家地理中的中国东北》（Mark C. Elliott, “The limits of Tartary: Manchuria in Imperial and National Geographi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9.3, 2000），603—646页。从建州女真分出左卫和右卫。海西女真也称扈伦四部。

③ fudu及其转变，见第六章最后数页的讨论。满文对于中国特别是北京地区的影响，见爱新觉罗·瀛生的《老北京与满族》（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19—30页及以后页码。该书提供了许多例证和轶事，也探讨了中文对于满人的影响。尽管是作为大众读物出版，但该书信息丰富，很有用。我感谢吴卫平（Wu Wei-ping）博士提醒我注意并惠借给我此书。

④该词首次出现，见 *Athenaeum*（1898年12月26日）747期（第3栏）。接受该词的学者中，包括伯希和（Paul Pelliot）、格鲁塞（René Crousset）、傅海波（Herbert Franke）、谢和耐（Jaques Gernet）、费正清（John K. Fairbank）、芮玛丽（Mary C. Wright）。伯希和使用该词，见魏特夫和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代》（Karl A. Wittfogel and Chia-sheng Fe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9），4页。格鲁塞使用“Sinicized”和“Iranized”，以描述中国和波斯历史上的入侵者和征服者，见氏著《草原帝国》（*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A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trans. Naomi Walford（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0），xxlx。该词出现在傅海波和杜希德主编《剑桥中国史·辽夏宋金元史》（*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907—1368, eds. 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240、244—245页。谢和耐的使用，见氏著《中国社会史》（*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rans. J. R. Foster（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reprint），186页，以及第16章。费正清使用该词，见赖世和、费正清编《东亚：伟大的传统》（Edwin O. Reischauer and John K. Fairbank, *East Asian: The Great Tradition*, Boston: Houghton Nifflin, 1960），152—153页及后面页码。芮玛丽对该词的使用，见氏著《同治中兴》（*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50—60页。

⑤它的原义，见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Oxford: Charendon Press, 2nd ed., 1989, 20 volumes），15: 529;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Unabridged*（Springfield, MA, Merriam Company, 1971），2125; *The Random Hous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Unabridged*（New York: Random House, 2nd ed., 1987），1785.

强调族群同化的学者，包括陶晋生（Jing-shen Tao）和达第斯（John. W. Dardess），分别见前者著《十二世纪女真 *Sinicization* 研究》（*The Jurchen in Twelfth-Century China: A Study of Sinicization*,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xiii页；后者著《征服者和儒家》（*Conquerors and Confucians*,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3），3页。对于制度采纳的研究著述包括安熙龙《马背上的统治：鳌拜专擅时期的满洲政治》（Robert B. Oxnam, *Ruling from Horseback: Manchu Polities in the Oboi Regency*, 1661—1669,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2页；韩大伟《脱去毡毛：游牧人的 Sinification》（David B. Honey, “Stripping off Felt and Fur: An Essay on Nomadic Sinification,” *Papers on Inner Asia*, Blooming, I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Indiana University, 21, 1992），1—39页。以及包弼德《求同：女真统治下的汉族士人》（Peter K. Bol, “Seeking Common Ground: Han Literati under Jurchen Rul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7.2, 1987），483—484页。包弼德对 sinicization 一词持批评态度。

⑥关于同化，见 *Encyclopedia Americana*（Dunbury, CT: Grolier, 2003, International ed., 30 volumes），第2册，530页；关于同化的机缘和变数，见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Amsterdam: New York: Elsevier, 2001, 26 volumes），第2册，848页。

⑦ 中国和这些边疆诸族的关系，见韩大伟《脱去毡毛：游牧人的 Sinification》，18—26 页。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Thomas J. Battlefield，*The Perilous Frontier*：*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Cambridge，MA：Basil Blackwell，1989），2—5 章。有关他们的占领和迁移，见王锺翰编《中国民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10—15 页。sinicization 作为中国历史形成中一个过程的讨论，见何柄棣《捍卫 Sinicization——驳斥罗友枝的〈再观清代〉》（Ping-ti Ho，"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oning the Qing'"，*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7.1，1998），125 页、130—135 页、143 页、151—152 页，以及他的《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6.2，1967），189—195 页。

关于匈奴人，见余英时《匈奴》（Ying-shih Yu，"The Hisung-nu."In Denis Sinor，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Asia*，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118—150 页。关于鲜卑，见王锺翰编《中国民族史》，182—203 页。谢和耐《中国社会史》，190—195 页。女真移民东北和他们的中国化，见陶晋生《十二世纪女真 Sinification 研究》，47—51 页以及第 4 章；姚从吾《东北史论丛》（台北：中正书局，1959 年，上下册），下册，31—64 页，118—74 页。

⑧ 这些专家，见埃勒《从文化到族性到冲突：对于国际族群决突的人类学考察》（Jack David Eller，*From Culture Ethnicity to Conflict*：*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on Internationl Ethnic conflict*，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9），9 页；麦克胡瑞狄编《文化、族群和身份：当前的研究问题》（William C. McCready，ed.，*Culture*，*Ethnicity*，*and Identity*：*Current Issues in Research*，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3），xxi 页；吴燕和《中国少数民族中的文化变迁和民族认同》（David Y. H. Wu，"Culture Change and Ethnic Identity among Minorities in China"，in Chien Chiao and Nicholas Tapp，eds.，*Ethnicity and Ethnic Groups in China*，Hong Kong：New Asian college，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89），11 页。

⑨ 族群群体与利益集团的关系，见莱特《族群的承继》（Ivan Light，"Ethnic Succession."In Charles F. Keyes，ed.，*Ethnic Change*，Seattl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981），55—56 页。1865 年皇帝上谕，见《清穆宗实录》，卷 133，2 页上至 3 页下，同治四年六月甲午。

⑩ 满族采用中国政治和法律制度，见第五章。皇太极对于中国人的政策，见 Gertraude Roth，"The Manchu-Chinese Relationship，1618—1636."In Jonathan D. Spence and John E. Wills，Jr. eds.，*From Ming to Ch'ing*：*Conquest*，*Region*，*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6—7 页、22—24 页。孔飞力在讨论乾隆期所面对的两个文化世界时，使用了"两个展现言辞的舞台"（two rhetorical arenas）一词，这可以运用到以前的清代诸帝的统治。见氏著《叫魂》，（Philip A. Kuhn，*Soulstealers*：*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Cambridge，MA，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60 页。

⑪ 这三位皇帝的劝谕，见第六至八章。康熙至乾隆清诸帝采取的措施，见第八章。

⑫ 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极力反对使用该词，认为该词已经陈旧，"概念上有缺陷，思想上无活力且不可能运用到真正的历史中"，见《对于中国早期近代族群的思考》（"Thinking about Ethnic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Late Imperial China*，11/1，1990）：1—5 页、22 页。她的循环解释看法，见前揭文，2 页。类似的批评也出现在氏著《满洲人》（*The Manchus*，Cambridge，MA：Blackwell，1997），5 页、13 页。欧立德认为该词具"误导性"，见氏著《满洲之道：中华帝国晚期的八旗制度和族群认同》（*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28 页。

罗友枝（Evelyn S. Rawski）认为该词是"二十世纪汉人对于中国历史的一种民族主义的解释。"见氏著《再观清代：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Presidential Address：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5.4，1996），831—832 页、842 页，以及氏著《清代宫廷社会史》（*The Last Emperors*：*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2—18 页，尤其是 2—3 页。

⑬ "汉"一词的起源与演变，见王锺翰编《中国民族史》149 页、155—156 页；贾敬颜《汉人考》，收入费孝通等编《中华民族多源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9 年），136—152 页。汉人及其文化的不同构成，见李洵、薛虹《清史全史》（第一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年），331—332 页。关于此词在元朝的意义，见姚从吾《姚从吾先生全集》（台北：中正书局，10 册），第 7 册，1—3 页。

⑭ 这些专家，见上面注 8。

⑮ 关于满人在帝国官僚中居支配地位，见罗友枝

《再观清代》，829—842 页，尤其是 832—833 页；满文作为一种安全语言（security language），见柯娇燕、罗友枝《清史中的满语》（"A Profile of the Manchu Language in Ch'ing History，" *Harvard Journal Asiatic Studies*，53. 1，1993），63—102 页。

⑯ 关于乾隆的侄子，见《清高宗实录》，卷 993，12 页上至 13 页下，乾隆四十年十月辛巳。

⑰ 有两篇文章论述满文档案。关于军机处档案的，是白彬菊《满文档案册籍对于清史研究的重要性》，（Beatrice S. Bartlett，"Books of Revelations：The Importance of the Manchu Language Archival Record Books for Research on Ch'ing History"，*Late Imperial China* 6. 2，1985），25—36 页。欧立德探讨了许多清朝档案。见他的《清代满文档案和奏折的起源》（"The Manchu-language Archives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lace Memorial System"，*Late Imperial China* 22. 1，2001）1—35 页。

关于中文的军事奏报，见《清穆宗实录》，卷 305，4 页上，同治十年二月辛未。满文奏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合肥：黄山出版社，1998 年，上下册）。

⑱ 例如，见柯娇燕《透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和认同》（*A Translucent Mirror*：*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99），342 页、352—253 页，以及《孤军：满族一家三代与清世界的终结》（*Orphan Warriors*：*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197 页。

⑲ 十九世纪下半叶满人与中国人一体问题，见芮玛丽《同治中兴》，50—56 页。关于清代对于中国贡献的积极认识，见李燕光、关捷《满族通史》（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1），452—500 页；萧一山《清代通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2 年），第一卷，773—855 页；朱诚如主编《清朝通史》（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2003 年，14 卷），第 6 卷，王思治编著《康熙朝》，第 9、11—13 章。

⑳ 与内亚的联系以及蒙古人所起的重要作用，见罗友枝《再观清代》，829—842 页，尤其是 831—834 页。对于罗友枝观点的驳斥，见柯炳棣《捍卫 Sinicization》，123—155 页。对于 sinicization 的指责，见柯娇燕《中国早期近代的族性思考》，2—5 页；利用内亚成员的思想形态和实践活动，见欧立德《满洲之道》，4—5，355 页。

㉑ 例如，佟养性和孔有德手下的炮兵部队帮助击败了明朝包括锦州在内许多城市的防御。见清史稿校注编纂小组《清史稿校注》（台北：中研院，1986—1991 年，16 册），第 10 册，8064 页、8124—8125 页。这三个蒙古部落，见《清太祖武皇帝弩尔哈奇实录》（北京：故宫博物院，1932 年），卷 1，10 页下至 11 页上。站在明朝一边的蒙古人，见《清史稿校注》，第 1 册，29 页、33 页。科尔沁与努尔哈赤的敌对，见阎崇年《努尔哈赤传》（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 年），49—52 页。婚姻外交，见满蒙联姻，第一章，第三部分。皇太极派兵远征林丹汗，见袁森坡《论皇太极统一察哈尔的斗争》，《清史研究集》第 6 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年），38—61 页。

㉒ 清朝军队中的汉人士兵，见温达等编《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北京：藏学出版社，1994 年，1708 年版影印本，上下册），上册：卷 6，37 页下至 38 页上，康熙二十九年六月；上册，卷 11，1 页上，康熙三十年七月；下册，卷 39，页 5 上。康熙三十六年三月。来自内地的军需补给，见《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上册，卷 25，页 28 下至页 29 下，康熙三十五年五月。

㉓ 关于努尔哈赤的抱怨，见广禄、李学智《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1971 年，上下册），下册，231—236 页。皇太极的命令，见《清太宗实录》，卷 1，页 19 上，天命十一年十月庚子。皇太极的牢骚，见《清太宗实录》，卷 1，页 19 下，天命十一年十二月庚戌；卷 4，页 23 下上至页 26 上，天聪二年十二月丁亥。关于该文件的翻译，见狄宇宙（Nicola Di Cosmo）、达力札布（Dalizhabu Bao）《入关前夕满蒙关系文献编年》（*Manchu-Mongol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Conquest*：*A Documentary History*，Leiden and Boston：Brill，2003），55—56 页，文件第 12 号。康熙蔑视蒙古人，见《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745 页，文件 1796 号所附朱谕；康熙五十年二月十六日；962 页，文件第 2465 号，康熙五十三年七月十六日；1435 页，文件第 3461 号，康熙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㉔ 1646 年内蒙古苏尼特人加入外蒙古车臣部叛乱，见《清史稿校注》，第 15 册，11896 页、11940 页。1675 年布尔尼率领的察哈尔部叛乱，见《清史稿校注》，第 10 册，8386 页《清代名人传略》，第 1 册，304—305 页。喀尔喀人的反叛，见鲍登《1756—1757 年的蒙古叛乱》，（C. R. Bawden "The Mongol Rebellion of 1756—1757"，*Journal of Asian History*，2. 3，1968），1—31 页。

㉕ 蒙古大学士和军机大臣，分别见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4 册），第 1 册，2—132 页、136—156 页。

㉖《旧满洲档》（台北：故宫博物院，1969 年，10

册）已部分翻译，有两个版本。一是广禄、李学智的《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另一个是《旧满洲档译注》，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印。《满文老档》有三个版本：两个汉文版，一个日文版。1929 年金梁翻译了其中的一些，取名《满洲老档秘录》（北平，2 册），对于金梁翻译的评论，见金毓黻《满文老档考》，《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汇刊》，第 1 期（1947 年），8 页。中文第二次翻译，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2 册），日文翻译，见《满文老档》（东京：东洋文库，1955—1963 年，7 册）。

更为早期的中文明清史料汇编是《明清史料》，有不同形式，在不同时期出版。后来的汇编名为《明清档案》，张伟仁编（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1992 年，261 册）。康熙、雍正朝奏折，见上面注 17。汉文奏折汇编，见《宫中档康熙朝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1967 年，全 7 辑；《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1977—1980 年，28 辑；《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1986 年，75 辑）。辽东档案汇编，见《明代辽东档案汇编》。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有八旗档案。《中国明朝档案总汇》是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辽宁省档案馆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101 册）。

㉗《明实录》最好的版本是由台北中研院刊行，黄彰健等人校勘。除正文外，还有二十一册附录和二十九册校勘记。对此著述的讨论，见傅吾康编《〈明史〉史料来源》（Wolfgang Frank，*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Ming History*，Kula Lumpur：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1968），3—23 页、30—33 页。《明史》由张廷玉等编，1739 年完成。最好的版本是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28 册）。

有两个版本的《清实录》。《大清历朝实录》，以 1936 年以传统的形式出版，有影印本（台北：华联出版社，1964 年重印，94 册）。另一种是《清实录》，共 60 册，是更好的版本，由中华书局出版。努尔哈赤朝的满文本《大清满洲实录》，名为 Daicing gurun i manju yargiyan kooli（台北：华联出版社，1964 年重印本，）一册。

国史编纂委会员编《朝鲜王朝实录》，汉城版做了索引，在每一页的边角有日期和卷数，是最好的（汉城：长白山版，1955—1958 年，48 册）。东京版《李朝实录》是由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于 1953—1967 年出版，共 56 册。

㉘ 这两种多卷本的著作，一种是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初集》。该书两次重印。前一次是 1968 年于台北（台湾学生书局，重印，40 册）；后一次质量更好，是在 1985 年（李洵、赵德贵主点，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8 册）。现在可以看到其满文版 Jakūn gūsai tung jy sucungga weilehe bithe（1739 年序）。另一种是《八旗通志》，包括了 1727—1799 年间资料，分别见卷 38—40 和卷 41—44）。三种有关旗务资料，其一是 Dergi hese jakūn gūsa de wesimbuhegge（雍正末年，10 册），中文名为《上谕八旗》（1723—1735 年，殿版，10 册）。一种是《上谕八旗议覆》（雍正朝，8 册），其满文版名为 Dergi hesei wesimbuhe gūsai baita be dahūme gisurefi wesimbuhengge（10 册）。最后一种是 Hesei yabubuha hacilama weimbuhe gusai baiti（10 册），其汉文版名为《谕行旗务奏议》，允禄等编（殿版，5 册）。关于满洲起源的汉文著作名为《钦定满洲源流考》，阿桂、于敏中编纂（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年，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14 辑，第 131 册）。

㉙明朝官员所辑、最初由程开祜编印的奏议，是重印本（北平：国立北平图书馆珍本系列一，第一辑，1936 年，1620 年序，44 册）。罗振玉编辑的这 97 件奏疏，见《史料丛刊初编》（无出版社，东方学会，1924 年，第 2—3 册），近来收入潘喆、孙方明、李鸿彬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二辑，1—116 页）。

熊廷弼奏疏集名为《按辽疏稿》，全 12 册，美国国会图书馆有缩微胶卷。千家庄见何尔健《按辽御档疏稿》，何兹全、郭良玉编（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 年），36—37 页。

㉚《辽东志》最早于 1443 年由毕恭编纂，他任辽东都指挥佥事。《全辽志》由李辅于 1565 年编纂，有六册六卷。两书都收录《辽海丛书》第二辑，分别是第 1—4 册、第 5—10 册。冯瑗编有带插图的地方志《开原图说》（见郑振铎编《玄览堂丛书》［无出版地：郑氏影印本，120 册］本，1941 年，第 26—27 册）。

㉛ 例如，德馨编《讷殷富察氏增修支谱》（无出版地：1889—1890 年，抄本）表明，几乎所有的第十二世男性成员都用“长”字作为他们名字的首字，见“第十二世”部分。这长久以来一直是中国人的取名传统。康熙皇帝是第一位采用中国人取名方式的皇帝。其他满人效而仿之。

皇族族谱名为《爱新觉罗宗谱》，由爱新觉罗修谱处编（沈阳：1938 年，8 册）。第一本名《星源集庆》。东洋文库所收该书，这支系中有多尔衮一系，见《太祖高皇帝位下和硕睿忠亲王之子孙》（抄本，3 册）。更多的支系，见多贺秋五郎《宗谱研究》（东京：东洋文库，1960 年），185—186 页。

这一谱牒的汉文名为《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新影印本有姓氏人名索引（沈阳：辽沈书社，1989

年)。其满文本名 Jakūn gūsai manjusai mukun hala be uheri ejehe bithe (26 册)。

㉜ 例如,《张氏家谱》由张朝璘、张朝珍编,有 1679 年序。《刘氏家谱》,刘安国 1684 年编(无出版地:页数不一);辽宁新发现的家谱,见李林编《满族家谱选编》(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 年);李林、侯锦邦编《本溪县满族家谱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 年)。

欧立德用很长的篇幅探讨满族编纂家谱的原因,见氏著《满洲之道》,326—329 页。但他对于皇帝努力以此保持满洲人身份认同,评价过高。

㉝ 至少有四种额亦都家谱:(1)《八旗满洲钮祜禄氏通谱》,由讷亲编(有 1747 年序,抄本,共 12 册,头六本是用汉文,后面是满文);(2)《镶黄旗钮祜禄氏弘毅公家谱》,阿里衮编(1765 年,10 册;《开国佐运功臣弘毅公家谱》,福朗编(抄本,1786 年,16 册);(4)《镶黄旗满洲钮祜禄氏弘毅公家谱》(抄本,15 册,无编纂者名)。

哈达瓜尔佳氏家谱的汉文名《正红旗满洲哈达瓜尔佳氏家谱》,恩龄编(1849 年序,8 册),在凡例中编者承认他效仿额亦都家族。

㉞ 茅瑞徵用的是笔名"苕上渔公",汉文书名为《东夷考略》(见郑振铎编《玄览堂丛书》本,1941 年,第 94—95 册)。一些学者已利用了该书。彭孙贻(1615—1673)似乎是其中的一位。他的书名为《山中闻见录》(《玉简斋丛书》,1910 年(?),第 4—5 册,有不同版本)。见《清代名人传略》,第 1 册,615 页。方孔炤的书是《全边略记》(北平:国立北平图书馆,1930 年,6 册)。

瞿九思的著作是《万历武功录》(台北:艺文印书馆,1980 年,重印本,5 册)。对于瞿九思本人及该书的深入讨论,见该书的前言,第 1 册,1—13 页。

㉟ 申忠一的著作《建州纪程图记》,原是向李朝统治者的长篇报告,收录在《朝鲜王朝实录》第 22 册,宣祖朝,卷 71,页 640—644,二十九年正月丁酉。该书有不同的版本。有一种收录在《震檀学报》,10(1939),160—175 页。有李仁荣的注解。李民寏的著作是《紫岩先生文集》(无出版地:1886 年跋,3 册),他的有关著述,见第 6 卷,1—7 页,副标题是《建州闻见录》。与其他材料比对,可知该记载是准确的。

㊱ 一位是王子李溰,即后来的孝宗(1650—1659 年在位),另两人是李澄和李浚。《沈阳状启》、《沈阳日记》、《沈馆录》,都收在《清史资料》第 3 辑《开国史料》(3),分别是第 7 册、8 册、9 册(台北:台联国风出版社,1970 年)。

满人死亡与打猎习俗材料,见《沈阳日记》,429 页及 494—500 页;朝鲜俘虏以及女真与朝鲜的婚生子,分别见《沈阳状启》,23—25 页、87—89 页。

㊲ 王桐龄文章《关于中国外来民族的汉化》,《史学杂志》47.11(1936);该文英文摘要,见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1937):38。毛汶关于满文的研究《满文汉化考略》,刊《国学论衡》,9(1937):52—76。关于满人中国化的概况,见李宇平《清入关前的汉化——太祖、太宗时期》,刊《史学汇刊》(师大),23(1979),53—65 页。

姚从吾的第一篇文章,见《国史扩大延绵的一个看法》,收入《东北史论丛》,上册,1—17 页。第二和第三篇文章,见《金朝上京时期的女真文化与迁燕后的转变》,收入《东北史论丛》,下册,31—64 页,以及《金世宗对于中原汉化与女真旧俗的态度》,收入《东北史论丛》,下册,118—174 页。第四篇文章,是一个特别的演讲,名为《女真汉化的分析》,《大陆杂志》,6.3(1953):91—103 页。

管东贵的著述,见《满族入关前的文化发展对他们后来汉化的影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0.1(1968):255—279 页。他的第二篇文章是《关于满族汉化问题的意见的讨论》,《大陆杂志》40.3(1970):94—97 页。他的第三篇文章《满族的人关与汉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3.4(1971):445—488 页。林克(Bernd-Michael Linke)的研究,见《满洲从汗国到官僚国家的演进》(*Zur Entwicklung des mandjurischen Khanats zum Beamtenstaat: Sinisierung und Bürokatisierung der Mandjuren wöhrend der Eroberungszeit*.(Wiebalen: Franz Steiner,1982),第 1 章、3—5 章。何柄棣文章,见《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189—195 页。郭成康的研究,见《也谈满族汉化》,《清史研究》2000 年第 2 期,24—35 页。

㊳ 对于清朝重要成就有许多总括性的研究。这里举两个例子:孟森的《清代史》在 1960 年重印(台北:中正书局),第 2 篇,第 2—3 章,及 340—370 页;朱诚如编《清朝通史》,第 6 卷《康熙朝》,第 9、11—13 章。女真人和满洲人的研究,见河内良弘《明代女真研究》(京都:同朋舍,1992 年);和田清《东亚史研究:满洲篇》(东京:东洋文库,1975 年);三田村泰助《清朝前史研究》(京都:东洋史研究会,1965 年);孙进己等《女真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 年);李燕光、关捷《满族通史》(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1 年);魏斐德的书(*The Great Enterprise*)由加利福尼大学出版社出版(Berkeley,1985 年,2 册)。

㊴阎崇年《努尔哈赤传》;孙文良、李治亭《清太宗全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3 年);金成基

《论顺治》，《文史哲》，1984 年第 5 期，42—48 页。白新良等编《康熙皇帝全传》（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 年）。雍正研究，见黄培《雍正史之论》（*Autocracy at Work*：*A Study of Yung-cheng Period*，1723—1735，Bloomington，I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4）；雍正对于康熙《圣谕十六条》的阐释，名为《圣谕广训》，有满文本，名 Enduringge tacihiyan be neileme badarambuha bithe（1724 年）。孙文良等《乾隆帝》（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年）。

㊵ 研究入关前满洲的国家、法律、政府制度的著作，见张晋藩、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年）。刘小萌的著作名为《满族的部落与国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 年）。神田信夫《清初的文馆》，《东洋史研究》19.3（1960）。鸳渊一《清代祖时代刑政考》，《羽由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东京大学东洋史研究会，1950 年）以及《清太宗时代刑政考》，《人文研究》2（1951 年）。

房兆楹的文章《清初满洲家庭里的分家子与未分家子》，刊《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北平：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 年），文学院第三种。杨英杰的著作《清代满族风俗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年）。

㊶ 赵振才的长文《通古斯—满语与文化》，刊《满语研究》，1986 年第 1 期，58—69 页；1986 年第 2 期，64—73 页；1987 年第 1 期，74—80 页。关于外来影响，见滕绍箴《明清两代满语满文使用情况考》，第 13 页，刊《民族语文》，1986 年第 2 期。季永海《论满语中的汉词借词》，22 页，《满语研究》，1985 年第 1 期。King 的文章，《1632 年满文改革中的朝鲜文因素》（"The Korean Elements in the Manchu Script Reform of 1632"，*Central Asiatic Journal*，3—4（1987）：252—86，）特别是 260—267 页。除季永海外，其他学者也研究中国语言的借词，如佟永功、关嘉禄《论满文中的汉语借词》，《满语研究》，1992 年第 1 期，270—279 页。

史蒂芬·达兰特（Stephen Durrant）认为，汉文的满文译本，并不是 sinicization 所推动，见《盛京朝廷的汉—满翻译》（"Sino-Manchu Translations at the Mukden Court"，*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99.4，1979），653—661 页。

㊷ 西方学者对满文文学感兴趣的学者，包括斯达里（Giovanni Stary），见《满文诗歌的基本原则》，"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Manchu Poetry" in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a Border Area Studies*，ed. Lin En-Shean，Taipei：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1985），187—221 页，以及丹尼斯·塞诺《关于满文诗歌的一些看法》（Denis Sinor，"Some Remarks on Manchu Poetry"，in Denis Sinor ed.，Studies in South East and Central Asia，Presented as a Memorial Volume to the Late Professor Raghu Vira by Members of the Permanent International Altaistic Conference，New Dehli：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1968），105—114 页。张佳生讨论了满族诗人的类别，见《清初满族词人及成就》，《满族研究》1991 年第 3 期，46—55 页和 21 页，以及《清代前中期满族布衣诗人述略》，《社会科学辑刊》1990 年第 1 期，140—145 页。该文包括了十二位布衣诗人。赵秀婷关于性德作品研究的重要文章，集中于其词，见《纳兰性德著作考》，《满族研究》1991 年第 2 期，53—62 页；1991 年第 3 期，56—69 页和 37 页；1991 年第 4 期，47—54 页。

㊸ 村田治郎的研究，见《奉天宫殿建筑史考》，（日本）《满洲学报》2（1993）。铁玉钦的文章《论清入关前都城城郭与宫殿的演变》，收入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秘书处论文组编《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年），637—658 页；关于盛京皇宫，见姜相顺、佟悦《盛京皇宫》（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 年），第 1—3 章。斯沃特、蒂尔《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宫殿与陵寝：满人对于中国建筑的采纳与变化》（Paula Swart and Barry Till，"Nurhachi and Abahai：Their and Mausolea，the Manchu Adoption and Adaptation of Chinese Architecture"，*Arts of Asia*，18.3，1988），148—157 页。

㊹ 萨满教研究的优秀著作，见富育光、孟慧英《满族萨满教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

顺治皇帝对于禅宗的兴趣，见《清代名人传略》上册，257 页。关于雍正皇帝的赞助，见清世宗《御选语录》（殿版，1733 年，14 册）。王俊中《"满洲"与"文殊"的渊源及西藏政教思想中的领袖与佛菩萨》，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研究集刊》28（1979），89—130 页。格鲁普《清初满族帝王崇拜：奉天供奉大黑天寺庙的文本及研究》（Samuel Martin Grupper，"The Manchu Imperial Cult of the Early Ch'ing Dynasty：Texts and Studies on the Tantric Sanctuary of Mahakala at Mukden"，Ph. D. Dissertation，Indiana University，1980），第 4 章。

㊺ 吕士朋《清代的崇儒与汉化》，收入《中央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考古组》，台北：中研院，1981 年，533—542 页。刘志扬《清政府建立后汉文化对满族文化的影响》，《黑龙江民族丛刊》，1992 年第 4 期，83—87 页。何炳棣的观点最集中表达在《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191—192 页，与《捍卫 Sinicization》，141—144 页。